

台湾研究优秀成果奖

获奖论文汇编

全国台湾研究会

周志怀 主编

杨幽燕 副主编

2013卷

台湾研究优秀成果奖

获奖论文汇编

全国台湾研究会

周志怀 主编
杨幽燕 副主编

2013卷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论文汇编. 2013卷 / 周志怀主编.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108-2845-4

I. ①台… II. ①周… III. ①台湾问题—文集 IV.
①D61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4295号

台湾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论文汇编 (2013卷)

作 者	周志怀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845-4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2013 年度台湾研究优秀成果评奖结果，于 2014 年 8 月在北京揭晓。经评奖委员会委员对申报成果进行匿名评审并投票，评出 2012—2013 年度台湾研究优秀论著一等奖 1 部，二等奖 1 部，三等奖 6 部；评出 2013 年度台湾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 1 篇，二等奖 5 篇，三等奖 15 篇。

本次评奖委员会委员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俞新天、厦门大学教授刘国深、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清华大学教授巫永平、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研究局副局长孙升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周志怀和全国台湾研究会研究员杨幽燕等人组成。

经公示，以下论著荣获 2012—2013 年度台湾研究优秀论著奖：

一等奖：

祝捷 《两岸关系定位与国际空间——台湾地区参与国际活动问题研究》

二等奖：

褚静涛 《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

三等奖：（排名不分先后）

王仲 张东保 《台湾文化与社会思潮》

严安林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理论研究》

沈惠平 《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实践研究》

陈小冲 《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研究》

张文生 《台湾政治转型与分离主义》

陈星 《民进党权力结构与变迁研究》

以下论文荣获 2013 年度台湾研究优秀论文奖：

一等奖：

彭维学 《和平发展时期的两岸政治关系探析》

二等奖：（排名不分先后）

杨丹伟 《两岸社会组织跨两岸社会的生成机制探讨》

唐 桦 《两岸合作治理的结构要素与实践机制》

信 强 《美国 TPP 战略与台湾加入之前景解析》

杨 剑 《选择性创伤的代际传递：“二二八”现象的当代政治分析》

张宝蓉 《外显与内隐：台湾中小学人文教育的实践解读》

三等奖：（排名不分先后）

汪曙申 《互信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的分析》

陈 星 《两岸关系中的话语权问题初探》

倪永杰 《两岸政治定位与“一中框架”刍议》

刘国奋 《论转型正义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化》

张 华 《马英九当局“双重提升”战略及其影响》

季 烨 《国际法的局限性：钓鱼岛主权争端的一个补论》

刘凌斌 《两岸政经互动：理论探索与路径选择》

唐永红 邓丽娟 《对两岸经济关系深化发展问题的探讨》

刘澈元 陈庆鹏 《两岸经济区治理研究：共同体视角》

王 华 邓丽娟 范 芹 《两岸经济相互依存的概念与度量方法》

李保明 《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环境、能力与战略分析》

吴巍巍 庄林丽 《台湾道台与海东书院的教育管理及其影响》

陈忠纯 《内战时期台湾〈公论报〉的左倾思想言论析论——以对和战的评价为中心》

徐纪阳 朱双一 《鲁迅台湾接受史论纲》

项筱刚 《民国时期流行音乐对 1949 年后香港、台湾流行音乐的影响》

全国台湾研究会

目 录

和平发展时期的两岸政治关系探析	彭维学 (1)
两岸社会组织：跨两岸社会的生成机制探讨	杨丹伟 (16)
两岸合作治理的结构要素与实践机制	唐 桦 (28)
美国“TPP 战略”与台湾加入之前景解析	信 强 (38)
选择性创伤的代际传递：“二二八”现象的当代政治分析	杨 剑 (51)
外显与内隐：台湾中小学人文教育的实践解读 ——以“九年一贯课程纲要”及教科书为中心	张宝蓉 (64)
互信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的分析	汪曙中 (76)
两岸关系中的话语权问题初探	陈 星 (88)
两岸政治定位与“一中框架”刍议	倪永杰 (99)
论转型正义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化	刘国奋 (110)
马英九当局“双重提升”战略及其影响	张 华 (120)
国际法的局限性：钓鱼岛主权争端的一个补论	季 烨 (130)
两岸政经互动：理论探索与路径选择	刘凌斌 (144)
对两岸经济关系深化发展问题的探讨	唐永红 邓利娟 (154)
两岸经济区治理研究：共同体视角	刘澈元 陈庆鹏 (163)
两岸经济相互依存的概念与度量方法	王 华 邓利娟 范 芹 (177)

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环境、能力与战略分析 李保明（196）

台湾道台与海东书院的教育管理及其影响 吴巍巍 庄林丽（206）

内战时期台湾《公论报》的左倾思想言论析论
——以对和战的评论为中心 陈忠纯（216）

鲁迅台湾接受史论纲..... 徐纪阳 朱双一（232）

民国时期流行音乐对 1949 年后香港、台湾流行音乐的影响 项筱刚（247）

和平发展时期的两岸政治关系探析

彭维学

2008年5月以来，两岸政治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柔性对抗”的新阶段，缓步推进，总体向好，但仍处于敌对状态与初级阶段，政治僵局仍未打破。当前，制约两岸关系的战略环境尚未根本改变，尤其是两岸政治互信和社会互信基础薄弱，两岸政治关系短期内难以实现重大突破。笔者拟从探讨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制约因素着手，就推动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策略与路径谈几点浅见，就教于各位。

一、两岸政治关系进展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确定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的三大议题：“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协商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其中，“合情合理安排两岸政治关系”，无疑是三大议题的核心。和平发展时期的两岸政治关系，其主要内涵包括政治互信、政治合作、政治安排、政治定位四个基本面向。其中，政治互信是基础，贯穿于两岸政治关系的始终。政治定位是关键，涉及两岸所有重大政治议题。政治接触、互动与合作是重要纽带，可促进政治互信，同时为政治安排、处理政治定位创造条件。政治安排是核心，是两岸政治关系发展中的规划与部署，也是具体成果的体现。与两蒋时期、李登辉执政后期、陈水扁时期两岸政治关系对抗、冲突、敌视、紧张的基调相比，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政治关系总体缓和，对抗冲突程度明显减弱，政治互动面向不断扩大，合作程度不断加深。

(一) 两岸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开始增进, 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一是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基础更加巩固, 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开始增进, 在“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共同振兴中华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趋于一致。马英九强调, “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 而是很特殊的关系”, “中国大陆是我们宪法上的国土”;^[1] 未来“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2012年3月,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与胡锦涛会面时, 首度提出“一国两区”, 强调“彼此都坚持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中”“自己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2013年6月13日, 吴伯雄会见习近平时表示, “两岸各自的法律、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 都用一个中国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2] 这是经马英九明确授权后、国民党首次在“一个中国框架”问题上作出明确表述。2013年7月20日, 马英九再次当选国民党主席后给习近平总书记回函时明确表示: “1992年, 海峡两岸达成‘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3] 这是马英九执政以来有关一个中国原则最为明确的表述。

二是大陆对台湾当局“正视现实”和“互不否认治权”的要求展现灵活性。大陆以“个案处理、权宜安排、注重需求、局部突破”为思路, 灵活处理两岸实务部门公权力行使、台湾基层民事调解书司法认证、台湾以适当身份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等问题。大陆在第五届海峡论坛上宣布: “最高人民法院将就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委员会出具的民事调解书作出司法解释。”^[4] 2013年10月6日,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印尼“习萧会”后与“陆委会主委”王郁琦“简短寒暄”时“互称官衔”, 在承认台湾方面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职能与权力方面迈出了重要步骤。三是两岸开始对对方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互体互谅, 展现善意。对于台湾当局“外交休兵”和“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主张, 大陆释放善意, 不仅低调处理与台“邦交国”关系, 还认可、甚至善意安排台湾以适当身份参与一些重要国际组织的活动。马英九当局也对大陆打击“藏独”“疆独”分裂势力的政策行为展现善意, 多次拒绝绿营邀请达赖、热比娅访台的要求。

(二) 两岸政治互动与合作创新模式、提高层级、拓宽领域、成效明显

一是两岸高层互动频繁。胡锦涛于2008年4月、李克强于2012年4月,

分别会见了以民间身份参加博鳌论坛的萧万长、吴敦义，开辟了两岸高层在大陆互动的新模式。借助一年一度的 APEC 峰会，胡锦涛自 2008 年 11 月以来，连续五年与连战会晤，开启了两岸高层以党职身份在国际场合互动的新模式。这些会晤对于两岸累积互信、解决台湾方面的紧迫性需求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是两岸两会“准官方谈判”成效显著。两岸官方人员以顾问或专家身份开展两会业务商谈，两岸司法互助、海关合作协议及两会磋商互设综合性办事机构都涉及政治问题，推动两会协商进入“经中有政”阶段，“为两岸架接了从‘互不否认治权’，逐渐走向‘相互承认治权’的桥梁”。^[5]

三是国共两党高层间接政治对话拉开序幕。自 2005 年 4 月“胡连会”以来，国共高层透过国共平台展开制度化交流，以“准战略对话”引领两岸政治关系。2012 年 10 月，马首次以国民党主席身份电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启国共领导人党对党互动新模式。2013 年 6 月举行的“习吴会”揭开了两岸高层政治对话的序幕，提升了国共平台的功能与影响，勾勒出两岸关系迈向“深水区”发展的路线图。^[6]另一方面，国共党际沟通平台——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自 2006 年建立以来，成功举办 9 届，形成了 100 多项共同建议。两党高层会晤机制、两党党际沟通平台，在促进两岸关系稳定发展、汇聚反“独”促和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两岸民间政治对话蓬勃展开。去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 2013 年以来，国共两党、两岸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库、学术机构、民间团体，先后召开多场有一定规模的研讨会，形成讨论两岸政治性议题的积极氛围与上涨声势。尤其是 2013 年 10 月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两岸和平论坛，搭建了两岸民间政治对话的机制化平台，深入探讨了两岸政治关系、涉外事务、安全互信、和平架构等四大政治议题，营造了两岸红、蓝、绿学者开诚布公地进行政治对话的良好氛围，达成了诸多前瞻性的共同认知，受到海内外广泛好评。

五是两岸军事安全互信取得初步进展。两岸退役将领交流层级提高、密度加大、形式多样、议题广泛，两岸联合人道救援和海陆空联合搜救演练不断提升层级，两岸军事演习和军事宣传用语有所克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两岸剑拔弩张的局面。

（三）两岸在高层互动、涉外领域的非正式政治安排收到良好效果

政治安排是两岸基于政治现实、两岸民意和政治互信，出于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制度化、两岸合作双赢、携手振兴中华的政治目标，通过高层互动、默契配合、政治协商与谈判、签订协议等途径，就两岸政治关系走向、重大政治议题前景、双方在两岸政治结构中责任、权力、权利的确认等所进行的共同规划、妥善部署、具体安排或共同声明，具有长期性、制度性、稳定性特征。

随着两岸政治互信的增强，大陆应台湾方面要求，经沟通磋商，在逐步提升两岸政治互动层级、减少两岸涉外领域内耗、协助台湾参与国际区域经济整合等方面，释放善意，适度回应，妥善安排。

在两岸高层互动领域，大陆领导人会见以适当身份参加博鳌论坛的台湾候任“副总统”和卸任“副总统”，允许台湾参与 APEC 峰会的领袖代表由“部长级”提升到卸任“副总统级”，这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根本不可能达成。2013 年 10 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陆委会主委”王郁琦在印尼“习萧会”后的“自然会面”，更是双方非正式安排的结果。

在涉外领域，2008 年以来，台湾“邦交国”数目维持不变、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以“贵宾”身份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年会、同大陆签署 ECFA 后再与一些国家签订经济性协议，这些“涉外成果”与两岸相互谅解、尤其是大陆善意安排密不可分。

（四）两岸对政治定位的政策主张与实际作为善意调整、累积共识

所谓定位，即确认名分地位。两岸政治定位是指两岸双方在政治上界定己方及对方身份、地位、权利、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双方关系性质认定的政策宣示、法理规定或共同声明，涉及中国主权、治权、国际代表权等核心问题。从国际法理论、中国宪法和国际政治现实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继承是“政府继承”的完全形式，不存在“国家继承”的问题，台湾是一个“处于内战局面的既成事实的地方政府”；^[7]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具有完整的国际法人资格，而“中华民国”欠缺国际法意义上的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但从两岸政治关系 60 多年的演进和台湾“宪法增修条文”看，上述“政府继承”没有完全完成，“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占有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迄今仍“有效治理台湾”，并维持一定数量的“邦交国”。

鉴于两岸“法统”的较量、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及“法理台独”主张，导致两岸政治关系长期激烈对抗，损害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两岸双方自 2008 年 5 月以来大幅调整了有关政治定位的政策主张。大陆

坚持“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台湾当局不具备“国家主权”、在国际上无权代表中国等宪法精神和基本原则，但在两岸政治定位问题上展现了极大的弹性与善意。一是默认台湾当局为中国主权和领土范围内“非主权国家但高于省的境外政治实体”^[8]；二是默认台湾享有“不完整国际法主体”的权益，甚至开始协助台湾扩大“有意义的国际参与”；三是明确提出“两岸从各自现行规定出发”，“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在此基础上“双方可以求同存异，增强彼此的包容性”。^[9]马英九当局在坚持“中华民国宪法”“宪法增修条文”“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同时，也在两岸政治定位问题上展现了一定善意，创造了一定的模糊空间。一是承认一中原则与“一中框架”。吴伯雄表示，“两岸各自的法律、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二是重申“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或国际关系”，而是一种特殊关系。两岸应采取“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务实态度来定位两岸政治关系。三是明确表示“中华民国领土主权涵盖台湾与大陆，目前政府的统治权仅及于台澎金马”，^[10]“政府不能否认大陆是一个统治当局”。^[11]

两岸在探寻政治定位问题上展现善意、累积共识、增强互信，为两岸政治关系注入了新的正能量。一是从两岸现行规定、体制蕴涵的一个中国原则出发，以“一中框架”来定位两岸关系，实际是认同“两岸法理一中”，维护了中国主权的完整性。二是明确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不是国际关系，蕴涵两岸是“特殊国内关系”。三是默认对方为非主权国家内的统治当局或治理当局，在承认对方“治权”合法性方面迈出关键步骤。四是明确并认可“一中框架”在两岸政治定位中的核心地位与关键作用。事实上，随着“一中框架”共同认知的不断增进，台湾当局“治理台湾”的合法性不断提升，享受的和平红利不断增多，这为未来不断明确两岸政治定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政治关系处于1949年以来的历史最好时期，发展质量超过了上世纪90年代初“汪辜会谈”前后的水平。两岸政治关系所取得的进展，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两岸政治互信和社会互信，深化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格局，降低了两岸紧张对抗，遏制了“台独”扩张势头，为大陆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为马当局和国民党创造两岸政绩、为台湾发展经济与扩大国际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两岸政治关系存在的问题

应该理性看到,当前两岸政治关系仍处于初级阶段和敌对状态,非官方性、非直接性特征明显,正常化、制度化、机制化、法制化水平较低。

(一) 两岸政治关系的敌对性质没有根本改变

上个世纪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依然存在,两岸在政治、军事、涉外、意识形态、社会心态等领域的柔性对抗仍较严重,台军以大陆为“唯一假想敌”的军事战略没有改变。在较长时期内,两岸之间的柔性对抗不会完全消除,成为制约两岸政治关系进一步深化的重要障碍。

(二) 两岸政治互信稳定性不高,制度化保障水平较低

一是“九二共识”“一中框架”暂时搁置两岸主权争议,以战略模糊方式求同存异,但根本争议仍未解决。二是“一中框架”理论化、协议化、法制化程度低。尤其是台湾方面对于“一中框架”仅见于口头表述,没有落实到政党政纲和相关法规之中,也没有得到岛内多数民众认同。在特定条件下,台湾方面所强调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一中架构”,异化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风险依然存在。更主要的是,一旦民进党上台执政,“九二共识”“一中框架”有可能被推翻。三是“一中框架”的包容性有待持续扩张,有关“台湾治权”的表述无法满足台湾需求。四是两岸在“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一核心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

(三) 两岸政治交流合作正常化、制度化程度较低

一是两岸官方公开、直接的政治对话管道仍未开启,两岸政治僵局仍未打破。二是两岸官方交流没有实现正常化、高层化、制度化、机制化。尤其是,两岸领导人建立热线电话、以适当身份会谈、公开互访等,迄未实现。三是两岸政党关系没有实现正常化,两岸党际交流间接、单向、不平衡特征明显。国共两党即使实现了高层交流,但主要是国民党高层来大陆交流,现任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中共领导尚难以赴台交流。民进党与共产党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现阶段民共两党不可能正式接触对话。

（四）两岸政治安排低层、低效徘徊，非正式性、权宜性特征明显

一是两岸政治安排的非正式性。两岸处理一些重大政治问题、重大利益关切没有进行正式的政治对话与协商谈判，主要依靠两岸互信、私下沟通，尤其是依靠大陆善意与让步，缺少制度化安排。二是两岸政治安排的个案性。有关两岸高层互动、台湾涉外关系的政治安排，只是个案处理、权宜安排，并不是整体规划、协议保障、通案解决的机制性安排。三是两岸政治安排的低敏感性与短期性。当前两岸政治安排的议题主要属于“政治浅水区”的低敏感度议题。由于马英九当局刻意冷却日益升温的两岸民间政治对话、以“全民共识”为由回避两岸官方政治对话，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和平协议等前瞻性、高敏感性议题，短期内难以提上政治对话与政治安排的议事日程。

（五）两岸政治定位的根本分歧仍未解决

一是双方对“中国主权与国际法主体归属”问题仍存在根本分歧。马当局刻意突出“一中内涵”差异，强调“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二是两岸没有公开承认对方“宪政秩序”“治权”“政权”的合法性。三是两岸在政治关系走向上看法分歧。大陆以“国家尚未统一”的论述，坚持和平发展的“统一指向”，提出“在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2]而马英九重申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现状，宣称“统一没有时间表”。由于两岸政治定位分歧，国民党调整两岸政策备感艰辛，“不仅必须因应对岸回避‘中华民国’的主权对立难题，还得防范绿营借‘修宪’将主权异化的企图”。^[13]

两岸政治关系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与不足，严重制约了两岸政治关系的进程、广度与深度，阻碍了两岸政治互信与社会互信的深入发展，限制了两岸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深度交流合作，削弱了两岸和平红利的扩散效应，极大地限缩了台湾“国际”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尤其是，两岸政治关系缺乏制度化、机制化、法制化保障，缺乏正式的、高层次的政治安排，不仅为美国等介入两岸关系、在两岸挑拨离间预留了较大空间，更主要的是给两岸和平发展留下了停滞不前、甚至紧张倒退的隐患与风险。

三、制约两岸政治关系的因素

当前，有利深化两岸政治关系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强，包括：大陆综合实力与影响岛内政局、两岸关系的实力持续增强，岛内支持两岸和平发展、开展民

间政治对话、进行政治接触互动的民意基础持续增强，有利于两岸融合、不利于“台独”发展的势头持续增强，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外部因素持续增强。但应该理性看到，这些积极因素尚不足以扫清两岸政治关系的结构性障碍。在较长时期内，制约两岸政治关系的战略环境与结构性障碍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美国推行“以台制华”战略，强力干预两岸政治对话协商，给两岸政治关系发展增添了极大阻力

美国是影响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外因，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在未来 20—30 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14] 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对手，将“以台制华”战略视为围堵、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之一。美国官方表面声称“欢迎两岸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但实质上希望两岸处于“不统不独不战不和”“可控制的不稳定状态”。美、日通过投资、产业链条及核心技术控制台湾经济，美国更在政治、安全、意识形态领域对台维持重要影响。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加紧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将以强化美台经济关系、提升美台军事关系、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阻挠两岸政治对话、扶持民进党“台独”势力为杠杆，增强台湾对美依赖，阻止两岸关系“过快过热”，破坏两岸政治互信，影响两岸政治关系进程。即使两岸民间就某些敏感政治议题达成共识，美国也将阻止两岸官方政治谈判和两岸官方交流的重大突破，阻止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签订和平协议。

（二）两岸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正常化、制度化、机制化水平和社会融合程度较低，突破两岸政治僵局的社会基础仍不坚实

过去五年是“两岸交流合作成果最丰硕、两岸民众得利最多、两岸内耗最少、两岸关系发展最迅速的时期”，^[15] 但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发展不平衡，制度化机制化程度不高。一是现有 19 个协议远不足以满足两岸大交流需要，协议落实成效也与预期效果有一定落差。二是两岸经济关系基础不牢，不对称性、不平衡性、非正常性特征仍较明显，两岸产业链、贸易链、价值链整合程度较低。三是两岸社会文教交流不够广泛、不够深入，两岸科技、法制、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交流相当有限。四是民进党抹黑两岸交流“财团化”“国民党化”“北部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导致两岸经济社会交流的政治外溢效果

未能充分发挥。

（三）两岸社会互信严重不足，尤其是岛内多数民众对两岸政治谈判疑虑较重，突破两岸政治僵局的民意基础仍不雄厚

推进两岸政治问题的协商解决，取决于两岸的格局、立场与政策，更取决于两岸人民的认知、意志与诉求。短短五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面影响，尚不足以弥平两岸政治体制、社会价值、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不足以扭转台湾民众“亲美媚日恐共”心态，不足以消除两岸民众在国家认同、台湾前途走向、两岸政治定位等重大问题上的歧见。多数岛内民众“中华民国情结”较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全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国家”的说法难以接受，^[16]对所谓“大陆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大陆导弹威胁”强烈不满，害怕过早推动政治谈判会损害台湾主体性和自由民主价值。^[17]萧万长认为，两岸分治 60 多年，政治观点认知，尤其涉及一个中国部分，仍有相当大的分歧，短期内没有政治谈判的条件。^[18]

（四）民进党“台独”势力诬蔑两岸政治谈判，严重阻碍两岸政治关系进程

从扩大“台独”社会基础出发，民进党长期阻挠两岸经济社会交流合作，强烈反对两岸政治往来，抹黑大陆“惠台让利”政策是“裹着糖衣的毒药”，诬蔑两岸政治对话是“统一谈判”“和平协议是统一协议”。迫于“台独基本教派”强烈反弹及群众基础“独”性较强的政治现实，加之阻止国民党两岸政策优势不断扩大的策略考虑，2012 年“总统”选举失败后一度摆出大幅调整两岸政策姿态的民进党，仍坚持以“台湾前途决议文”为基调的两岸政策立场，极力阻挠两岸政治对话。苏贞昌声称：“台湾不能受制于中国设定的议程，要在中国的框架之外，主动提出以台湾为主体的议程。”^[19]蔡英文所属青壮派表示：“在大陆民主化前，台湾无法与大陆进行政治谈判。”^[20]未来几年，民进党除极力塑造民共对话假象、摆出与大陆交往姿态、展现“处理两岸关系能力”外，不可能放弃“台独”立场，不可能支持两岸在“一中框架”下发展政治关系。

（五）两岸在政治博弈过程中算计较多，尤其是台当局两岸政策具有较强的局限性、保守性与工具性，极大地制约了两岸政治关系的进程

近 5 年来，两岸尤其是大陆处理两岸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展现了振兴中华

的高度、“两岸一家”的胸怀。但不容否认，因政治互信不足，两岸在推动政治关系过程中仍有不少政治算计的成分。台湾方面以两岸政治对话、和平协议，作为谋求大陆正视两岸“分治现状”、承认“中华民国治权”的筹码。

当前，马英九把巩固权力、深化改革和拼经济作为摆脱执政困境的优先选择，担心开启两岸政治对话会引起美国、民进党反弹，影响 2014 年“七合一”选举和 2016 年“总统”选举。同时，马寄望以“先经后政”“政经分离”策略，通过在大陆与美国之间维持平衡关系，既得到更多两岸和平红利，又得到更多美国政治安全承诺，为巩固执政地位、为国民党 2016 年“大选”营造利多。

受上述因素制约，加之 2014 年、2016 年台湾选举期的到来，马当局的两岸政策难有大幅调整，两岸政治关系可能维持小步慢进的既有格局，通过政治对话来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签署和平协议，短期内仍有较大难度。

四、推进两岸政治关系的策略路径

鉴于“国家尚未统一”、两岸政治关系尚处于初级阶段、制约两岸关系的战略环境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的政治现实，我们应把握国际政治格局和两岸关系演进大势，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以“一中框架、统一指向、务实协商、权责结合”为原则，以“壮大综合实力、增进政治互信、巩固强化基础、深化互利融合、循序渐进推动、务实平等协商、加强理论创新、合情合理安排”为路径，合理规划推进两岸政治关系的路线图，不断推进两岸政治关系。

路线一：壮大自身综合实力，优化两岸关系战略环境，扭转岛内民众“亲美媚日恐共”心态

中美综合实力博弈，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两岸政治关系的进程与质量。一旦中美实力对比发生有利于我的质变，就能从根本上扭转制约两岸政治关系的战略环境。届时，“大陆强台湾弱”的趋势更为明显，大陆影响两岸关系、岛内政局的实力显著增强，处理两岸政治关系、推动理论创新将更加自信。美国对台政经影响明显下降，美国介入两岸关系的成本大幅增加，介入两岸关系的能量与意愿下降。台湾民众“亲美媚日恐共”心态将根本扭转，对大陆向心力明显提升，对两岸政治安排的要价趋于合理。民进党两岸政策立场